

《荀子·大略》为荀子读书笔记说

俞志慧

杨惊《荀子·大略》解题云：“此篇盖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也。”杨惊之说似已为今人之治《荀子》者的共识，如吕思勉《经子解题》、梁启雄《荀子简释》、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杨柳桥《荀子诂译》、张觉《荀子校注》等讨论到《大略》的性质时，或径引杨注为说，或将其意易为白话作解，董治安先生虽发现其中多与《荀子》他篇“相同或相通”，又屡屡称引《诗》、《易》、《礼》、《春秋公羊传》等，“亦与荀卿传诸经之说相符”，但仍然肯定杨惊“盖弟子杂录荀卿之语”的判断不无道理（董治安《先秦文献与先秦文学》，齐鲁书社1994年版，第292页）。细玩该文，杨惊此解实有未当，理由如次：一是关于“荀卿之语”，观文中四分之三条目可于先秦同期文献考见，且其中许多文字出现的时代明显早于荀子。二是关于“略举其要”，若准其说，则相关内容当有其详可待考见，但偏偏有些条目的表述本已不厌其烦，未得其“要”，另有一些条目（譬如有关礼制的若干内容）则本来就是三言两语，不容再“略”。三是从思想内容上考察，倘若果如杨说，则《大略》的内容应与荀子的一贯思想吻合，但细检文中各条，某些条目与《荀子》他篇所反映的思想并不合拍。综合以上三点，可知杨惊对《大略》性质的认识有待重新检讨。

一

综览《大略》全文，复与相关周秦汉文献仔细比对，窃以为《大略》系荀子的读书笔记，其中多为荀子对固有文献的摘录，以备写作、教学及游说之用，这一点与《韩非子·说林》的大多数条目相同，吕思勉（1884—1957）在评价《韩非子·说林》时说：“此可见古人‘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之义。”（吕思勉《经子解题》，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4页）这个判断同样适用于《大略》的这一部分内容；也有在固有文献之后略加三五

字的按语，作为阅读心得或日后写作的备忘，这一类型的内容可以与《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孔子诗论〉》孔子评诗、《左传·襄公二十一年》季札评乐比观，从中可约略窥见当时人的阅读方式；还有阅读中碰撞出的思想火花、思考过程中的智慧闪光，随手记下，并用经眼的固有文献作佐证，此类条目粗具议论文雏形，其文体意义也可与《竹书〈孔子诗论〉》、《韩非子》之《解老》、《喻老》及《说林》机械摘录以外的十余条和《韩诗外传》、《淮南子·道应训》等互相照亮，但这些内容置于半为机械摘录的《大略》中，仍不能视为有意为文——只能视为读书笔记。基于这个现象，“大略”的得名也就不是杨惊所说的“皆略举其要，不可以一事名篇，故总谓之‘大略’”，而应该是作者广泛阅读过程中的笔记，“略”者，取也，西汉扬雄（前53—18）《方言》卷二云：“搜、略，求也。秦晋之间曰搜。就室曰搜，于道曰略。”（钱绎《方言笺疏》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26页）《左传》之《宣公十五年》“以略狄土”、《成公十二年》“略其武夫”杜预注皆训“取”（《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88页上、第1910页下），是其证。

如果将《大略》与《荀子》他篇相重的十九则语段对勘，还可以看出《荀子》某些章节的酝酿、形成过程：这些内容在《大略》中出现的大都较相重的他篇为简洁，从中可清晰看出，其他篇章中出现的相重文字皆经由作者深加工，思想及文字上有所取有所不取——于是更切合于荀子的一贯思想，形式上更为繁复、整饬——而浑厚繁复正是荀文的一个特点。与《韩非子·说林》不同的是，韩非子所摘录者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居多，生动隽永，内容亦紧密围绕韩非的法术势思想；而《大略》所载，多为儒书，尤重礼制，庄严正大，从中可见荀子的知识背景、阅读兴趣及思想倾向。基于这一点，《大略》虽非荀子的作品，但可由此考见荀子的思想话语资源、阅读写作方式及思想形成过程；同时，《大略》中的多数

内容毕竟不是荀子所作，因而，讨论荀子思想与文风时有必要将它与《荀子》其他篇章作区隔。

二

本人在前贤基础上将《大略》互不连贯的内容分解为一百二十一则，并逐条考辨其所从来与其所增损，得出以下数据：其中自称掇拾旧文、明述古制以及文字全同于先秦同期文献者计六十六则；对旧文略加剪裁、组合者计十则；先出以荀子的心得，再以旧文证成之者计十二则；在摘录旧文之后，继之以摘录者感受者计五则。三者累计九十三则，占全文四分之三的篇幅。其中文字未见于先秦其他同期文献者二十八则，但即使是这二十八则，亦未必就是荀子之创作，如“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贵师而重傅则法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贱师而轻傅则人有快，人有快则法度坏”一段，虽未见于先秦同期文献，类似的说法则有“帝者与师处，王者与友处，霸者与臣处，亡国与役处”，相似的表达分别见于《鹖冠子·博选》、《新书·先醒》、《淮南子·论言》、《韩诗外传》卷五和卷六等；又如“争利如蚤甲，而丧其掌”，同样的文字虽也未见于同期文献，但可能是当时常喻，如《易·井》九二爻辞“井谷射鲋，瓮敝漏”，意义及表达法皆与此相似。因此，《大略》中源自先秦文献的内容肯定比上述统计数字要多，而该篇作为读书笔记的特色也并不因此而被遮蔽。

为了彰显《大略》的这个特色，下面就上述前三种类型各举三例，并略作说明，文字据《诸子集成》本王先谦《荀子集解》。

一、摘录固有文献，可分为对固有文献的机械摘录和根据需要剪裁两种情况，前者如：

1. 诸侯相见，卿为介，以其教士毕行，使仁居守。此陈诸侯相见之礼，文又见于《大戴礼记·虞戴德》：“诸侯相见，卿为分（‘介’字之形近而误），以其教士毕行，使仁守会。”《穀梁传·隐公二年》：“知者虑，义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后可以出会。”《穀梁传·桓公十八年》、《韩诗外传》卷九也有相近文字。

2. 聘人以圭，问士以璧，召人以瑗，绝人以玦，反绝以环。

此盖传抄古礼。《周礼·春官·典瑞》：“珍圭以征守，以恤凶荒。……谷圭以和难，以聘女。琬圭以治德，以结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玦之谐音“决”、“决”，在《左传·闵公二年》、《国语》之《晋语一》叙晋世子申生事及《晋语二》

晋骊姬使奄楚以环释言于夷吾时已有呈现，则此类礼俗至迟在春秋前、中期已有。

3. 亲迎之礼，父南乡而立，子北面而跪，醮而命之：“往迎尔相，成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则有常。”子曰：“诺！唯恐不能，敢忘命矣！”

此述亲迎之礼，其仪注又见于《仪礼·士昏礼》：“父醮子，命之曰：‘往迎尔相，承我宗事。勖帅以敬先妣之嗣，若则有常。’”子曰：‘诺！唯恐弗堪，不敢忘命！’”

后者如：

1. 聘士之义，亲迎之道，重始也。

本条亦述既有礼制之义，唯与前一条所引《易·咸》相先后，《周易》之咸卦在下经之始，与《仪礼》士礼以士冠礼、士婚礼为首，《诗经》以房中乐《关雎》为首用意类似，则荀子将这两条置于一处，虽属过录旧文，但有以类相聚之意，或者竟因上条连类而及。

2. 少不诋，壮不论议，虽可，未成也。

《大戴礼记·曾子立事》：“其少不诋诵，其壮不论议，其老不教诲，亦可谓无业之人矣。少称不弟焉，耻也；壮称无德焉，辱也；老称无礼焉，罪也。”王念孙据此认为“少不诋”下当有“诵”字，方称文完意足（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一二，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2页），可从。《大略》较《曾子立事》少一“老”的内容，或者荀子为了更有针对性，故抄录或讲解时有所取有所不取。

3. 知者明于事，达于数，不可以不诚事也。故曰：

“君子难说，说之不以道，不说也。”

《鬼谷子·谋篇》：“夫仁人轻货，不可诱以利，可使出费；勇士轻难，不可惧以患，可使据危；智者达于数，明于理，不可欺以诚，可示以道理，可使立功。是三才也。”本条仅取其一。《论语·子路》：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将两则固有文献并置，非简单的摘录，而已具笔记的性质了。

又，用固有文献为经典文本作解，系当时传经的常见方式。

二、摘录固有文献之后略加按语，如：

1. 迷者不问路，溺者不问遂，亡人好独。《诗》曰：“我言维服，勿用为笑。先民有言，询于刍蕘。”言博问也。

“迷者”三句又见于《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其后有引用有解释，“言……也”又为当时释文常语。

2. 不知而问尧、舜，无有而求天府。曰：先王之道，则尧、舜已；六艺之博，则天府已。

于鬯曰：“此二语必当时俗言以讥世者，其意犹孟子言道在迹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下文乃转出‘曰’字，以善解之。”（于鬯《香草续校书》，《清代学术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9页）其说可从，而“曰”下之文，又未必为俗言本意，疑为荀子的定向阐释。

3. 语曰：“流丸止于瓯、臿，流言止于知者。”

此家言邪说之所以恶儒者也。是非疑，则度之以远事，验之以近物，参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恶言死焉。

在引述古“语”民谚之后，有作者的阐发，因而不是简单的摘录。

三、随手记下的思想火花、智慧闪光，用经眼的固有文献作佐证，如：

1. 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

立太学，设庠序，修六礼，明十教，所以道之也。《诗》

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

杨注：“十，或为‘七’。”

《礼记·王制》：“司徒修六礼以节民性，明七教以兴民德，齐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王念孙据此以为当从或本（王念孙《读书杂志》卷一二，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20页），可从。不仅如此，本条之渊源也于焉可见。

“家五亩宅”一段，又见于《孟子·梁惠王上》，即使在孟子也不一定属首创，而系当时一般人心目中农业社会的理想境界。

2. 君子之学如蜕，幡然迁之。故其行效，其立效，其坐效，其置颜色、出辞气效。

《论语·泰伯》记曾子言曰：“君子所贵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行、立、坐是“动容貌”，连同下文的“颜色”、“辞气”，不仅意义与《论语》相同，即次序亦无殊。

3. 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诗》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谓学问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为天子宝。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

《韩诗外传》卷八：“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贡，卫之贾人也。皆学问于孔子，遂为天下显士。”《尸子·劝学》亦载同一内容，知为当时常见的励志话头，荀子录之作为“人之于文学”二句的佐证。

三

作家所见之旧文与作家自己的创作之间，往往不易

找到其间的相通之处，但是，《大略》却给我们提供了其中若干线索。《大略》与《荀子》他篇文字相重者共十九条，从中正可见《荀子》部分章节的素材乃至荀子思想形成过程，譬如：

1. 君人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

前三句又见于《强国》，唯彼处下有“权谋倾覆幽险而亡”八字，或为荀子对固有文献的踵事增华。

2. 礼之大凡：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军旅，饰威也。

《礼论》：“凡礼，事生，饰欢也；送死，饰哀也；祭祀，饰敬也；师旅，饰威也。”比《大略》多一“祭祀”，似属后出转密。《淮南子·本经》：“故钟鼓、管箫、干戚、羽旄，所以饰喜也；衰经、苴杖，哭踊有节，所以饰哀也；兵革、羽旄、金鼓、斧钺，所以饰怒也。必有其质，乃为之文。”其中也无“祭祀饰敬”一句，则《礼论》该句或为荀子所增益。

3. 君臣不得不尊，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夫妇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故天地生之，圣人成之。

《富国》：“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父子不得不亲，兄弟不得不顺，男女不得不欢。少者以长，老者以养。”《富国》“故曰”以下或即引旧文以证前文的观点“一天下，治万变，材万物，养万民，兼制天下者，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此“仁人之善”被荀子展开成为“智虑”、“仁厚”、“德音”，归结到一个“德”字，故有“君臣不得不尊……”的结语，旧文本作“得”，荀子虽袭用其文，其义却借作“德”——“断章取义，予取所求”，亦春秋用诗、释义的传统，在《韩非子》之《解老》、《喻老》中更成为他援老人法的武器。

4. 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

《礼论》：“礼之中，焉能思索，谓之能虑；礼之中，焉能勿易，谓之能固。能虑、能固，加好者焉，斯圣人矣。”后面一段，同样可视为荀子在前人思想基础上的踵事增华，后者思想更丰富，表达更整饬。

5. 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礼论》上引文字之后云：“礼者，以财物为用，以贵贱为文，以多少为异，以隆杀为要。”末句当系荀子增益。

6. 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成、康，则案无诛已。

《仲尼》：“故圣王之诛也綦省矣。文王诛四，武王诛二，周公卒业，至于成王，则安以无诛矣。故道岂不行矣哉！”

观《仲尼》该段文字首尾尚有总论性的话语,或者《大略》本条为儒书旧有之文,而《仲尼》则是荀子在旧文基础上的穿靴戴帽。

7. 多言而类, 圣人也; 少言而法, 君子也。多少无法而流, 喆然虽辩, 小人也。

杨注: “喆, 当为‘洎’。”

《非十二子》: “故多言而类, 圣人也; 少言而法, 君子也; 多言无法而流, 洎然虽辩, 小人也。”本段作为结论置于“知默由(犹)知言”的讨论之下, 从中可见荀子思想的渊源。

8. 劫迫于暴国而无所辟之, 则崇其善, 扬其美, 言其所长, 而不称其所短也。

《臣道》: “迫胁于乱时, 穷居于暴国, 而无所避之, 则崇其美, 扬其善, 违其恶, 隐其败, 言其所长, 不称其所短, 以为成俗。诗曰: ‘国有大命, 不可以告人, 妨其躬身。’此之谓也。”与《大略》对比, 《臣道》更为整饬而详尽, 可见有继承, 更有发展。

9. 惟惟而亡者, 诽也; 博而穷者, 訾也; 清之而俞浊者, 口也。

《荣辱》: “快快而亡者, 怒也; 察察而残者, 忮也; 博而穷者, 訾也; 清之而俞浊者, 口也; 蒙之而俞瘠者, 交也; 辩而说不说者, 争也; 直立而不见知者, 胜也; 廉而不见贵者, 刳也; 勇而不见惮者, 贪也; 信而不见敬者, 好刳行也。此小人之所务, 而君子之所不为也。”两相对比, 《荣辱》有大量增益, 则前者当系固有之文, 而《荣辱》此条为荀子踵事增华。

基于上面的文献分析, 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大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荀子作品, 而是他的读书笔记, 其中有机摘录, 有有机组合, 有简明扼要的评点, 也有相对比较完整的阅读心得。笔者并不想否定《大略》的价值, 更无意将《大略》从《荀子》中剔除, 只是想还其本来面目, 找到它应有的位置与价值。从文献比对中可以发现: 即使是纯粹的过录旧文, 许多地方仍可以发现以类相从的迹象, 更何况也有十来条相对比较完整, 已粗具议论文的规模。从这些摘录、评点和心得中可以看出: 荀子的阅读对象非常丰富, 但主要集中在儒书, 而尤重在礼制, 从中可见其阅读倾向、学术兴趣; 在以类相从的摘录中、在对固有文献的评点中、尤其是在相对比较完整的读书心得中, 可以透视到荀子思想的知识背景, 还可以发现荀文中部分章节的形成过程。

但是, 应该承认, 《大略》的意义是有限的, 所有这

些摘录、评点及读书心得, 毕竟不是严格意义的荀子作品, 所以, 不能据以讨论荀子的思想及文风。

《大略》篇如是, 那么, 荀文中其他与先秦文献重出的篇、章、节呢? 为便观览, 兹在谢墉《荀子笺释》(王先谦《荀子集解》附《考证·上》, 第8—10页)、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沈文倬《葑阁文存》, 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第1—58页)的基础上将二者相关的文献表列于后:

《荀子》(篇名)	其他先秦文献
《劝学》	《大戴礼记·劝学》
《礼论》	《礼记·三年问》
《礼论》	《大戴礼记·礼三本》
《乐论》	《礼记》之《乐记》、《乡饮酒义》
《法行》	《礼记·聘义》
《法行》	《大戴礼记·曾子疾病》
《宥坐》	《大戴礼记·劝学》
《哀公》	《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

鉴于有这么多的重出现象, 我们讨论荀子的思想与文风时就有必要先做一番梳理工作, 将荀子的知识资源、思想背景与属于荀子个人的贡献作一区分。

更进一步, 从《大略》及其他《荀子》篇章与先秦文献的重出现象中, 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 诸子乃至当时人有着大致相同的知识背景、话语资源、思想渊源甚至问题意识, 他们的“同”远多于“异”, 因而, 后人若仅仅根据个别字句特别是残存文献中的片言孤证来推定其作者、其学派归属、其思想倾向, 那是不大靠得住的。试举一例, 1957年, 河南信阳长台关一号楚墓出土了一批竹简, 关于第一组断残竹简的学派性质, 李学勤先生根据文句中有“先王”、“周公”、“三代”、“君子”等词语, 判断它应属儒家(李学勤《信阳楚墓中发现最早的战国竹书》, 《光明日报》1957年11月27日), 当时的发掘报告也有与之相似的推论; 1990年, 李先生又写了一篇题为《长台关竹简中的〈墨子〉佚篇》的论文, 根据竹简中有“贱人”、“尚贤”特别是其中有一段与《太平御览》卷八〇二“珍宝部”中一段《墨子》佚文相近的文字, 转而指该简文为《墨子》佚文(原载《徐中舒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文集》, 巴蜀书社1990年版, 第1—9页; 后收入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 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第327—333页)。李先生知过则改的勇气可嘉, 其新说也获得了学界的广泛认可, 但也迎来了杨泽生的质疑, 杨君的《长台关竹书的学派性质新探》主要依据李先生的一些材料, 同时又援引先秦儒书中的相似之处, 从思想内容和用词习惯两方面断定该简文为儒家作品(杨泽生《长台关竹书的

学派性质新探》，《文史》2001年第4辑，第31—37页）。讨论双方观点相左，但方法却惊人的一致：一、都是根据断残竹简的简文推论；二、都隐含着以下一些逻辑假定：当时所有的形诸文字的材料都有明确的学派归属，而且每个言说者的每一段言说都是立场显明，毫不含糊；凡是提到相关学派及其关键词的都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并且已经排除了出现类似以下材料的可能性：《墨子·公孟》中“公孟子戴章甫、搢忽（笏）、儒服”，并说“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庄子·大宗师》中述及颜回坐忘、《庄子·外物》中描述儒生用《诗》、《礼》发冢。其实，诸子百家就

其相异处而言，自然是派内有派，所谓“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韩非子·显学》）。但是，就其相同处而言，不管哪家哪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文化平台，因而他们有着大致相同的知识背景、大致相同的话语资源、大致相同的思想渊源和大致相同的问题意识，而这一点，有时更为波澜壮阔，更为意味深长，如果无视这种现象，我们就有可能会将当时的通识指派为某人的卓见，视《大略》为荀子的作品并进而据以讨论其思想其文风，正是这种迷思的具体而微的一个显例。

[作者单位：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

韩愈尊孟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探析

兰 翠

“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叶燮《原诗》内篇上）韩愈诗歌的变化，引起了后代诗评家褒贬不一的议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阐发韩愈诗歌变化的成因，但对韩愈尊崇孟子而影响其诗歌创作的探究则有所忽略，本文拟就此略抒浅见。

一

《旧唐书·韩愈传》载：“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韩愈以振兴儒学为己任，而在前代诸多的儒者中，他最推崇孟子。韩愈尊崇孟子，无论是基于维护儒学正统的理性判断与选择，还是出于性格原因在情感上对孟子的喜好与偏爱，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都是不能忽视的。韩愈诗歌广为学界所关注的尚奇险、尚气势、重主观的艺术特征显明独特，这些创变与他尊崇孟子都有着深层次的关联。

韩愈倡导儒道与崇孟，使他的诗歌创作淘选吸收了先秦两汉经史百家中大量的语料，为他的诗歌创作建立起一个丰富的语料库，这些语料，正是构成韩愈诗歌光怪陆离生新奇险特征的主要元素。从我国诗歌史上看，

在韩愈之前的唐诗，已有李白、杜甫两座诗界高峰，在韩愈的同时，又有白居易等诗坛名家。因此，韩愈要实现诗歌自立门户的创变，必须努力建立起不同于前人又独立于时人的诗歌语料体系，以构筑起自己古雅而又显生新的诗歌语言特点。学者们普遍认为韩愈散文的语言“惟陈言之务去”，是因为他广泛学习并汲取了秦汉散文的语言精华：“沉浸浓郁，含英咀华。作为文章，其书满家。上规姚姒，浑浑无涯。周诰殷盘，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韩愈《进学解》，《全唐文》卷五五八）其实，韩愈诗歌的语言又何尝不是这样。下面我们仅列举一些他诗歌中使用《孟子》中的语汇，就可略见一斑，如《北极赠李观》：“所尚苟同趋，贤愚岂异伦。”“同趋”，语出《孟子·告子下》：“三子者不同道，其趋一也。”《县斋读书》：“投章类编带，伫答逾兼金。”“兼金”，语出《孟子·公孙丑下》：“陈臻问曰：‘前日于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赠张籍》：“惧其无所知，见则先愧赧。”“我身蹈丘轲，爵位不早绾。”“愧赧”，语出《孟子·滕文公下》：“观其色赧赧然。”《符读书城南》：“木之就规矩，在梓匠轮舆。”“梓匠轮舆”，语出《孟子·尽心下》：“梓匠轮舆，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城南联句》：“浙玉炊香粳，朝饌已百态。”前句语义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荐士》：“孟轲分邪正，眸子